

# 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史与学科性

文/汪卫华

比较政治是“学”吗？乍看上去，这是常识；但这个“学”字，到底是指“学问”“学科”还是“科学”？我们谈论“比较政治学”时，究竟是指关于“比较政治”这一客观对象的“系统知识”（学问）、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或“教学科目”（学科），还是反映某类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

## 引进来的“学科自觉”

中国有三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深厚思想传统，但“政治学”却无疑是近代西洋舶来品。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学科意识的强化，原本在美国政治学界惯用的“比较政治”研究领域，被国内同仁习惯称之为“比较政治学”。但在引进和塑造“学科自觉”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并未特别留意斟酌欧美政治学中具体研究领域的划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只不过依照一般的术语标签惯例，把比较政治研究称为“比较政治学”，却往往忽略了这个说法在中文语境之中是否符合一种“学问”或一项“学科”的命名习惯，是否有明确清晰的语义边界。另外，“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本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如果不澄清其研究对象、实质内容，界定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比较政治学”就不过是引进来、照着讲的“方便标签”，也无益于确立真正的“学科自觉”。

## 作为“学问”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如何变成外国政治

与国际关系不同，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的研究对象都是“国内政治”，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追求上，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本无实质区别。“比较政治”在美国政治学中成为与“本国政治”并立的研究领域，其实恰恰是“美国政治”研究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初步成熟的副产品。

从1880年算起，回顾美国政治学的前70年，我们不难发现，“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厘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学形成学科自觉、建章立制，把“比较政府”确立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第二阶段则是

在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突出“美国政治”的地位，确立新的核心关切，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并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导向“行为主义革命”；与之相应，“比较政治”的范围则被压缩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其实，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以“比较政府”为内容的“比较政治”，不但在研究视野上并没有明显拓展，在研究方法上更缺乏改进的自觉，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新学问”。

## 作为“学科”的比较政治：问题意识与知识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三重变化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革命性繁荣创造了条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比较政治”逐渐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成为政治学中最富有理论创造力的研究领域。

首先，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实现了民族解放、独立建国。非西方世界新国家的成批涌现，要求政治学加强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加强对“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总结欧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新独立国家勾画政治发展“蓝图”。

其次，美国在战后确立了其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入“冷战”对抗。政治学顺势成为“冷战”显学，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最先受到影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比较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基本都是“冷战”的时代产物，这两大领域理论创新的“黄金时期”也都在20世纪的后50年，而非21世纪的前20年。

最后，受战后“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辐射效应，以及政治学之外的系统论思潮、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和逻辑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了“科学自觉”基础上的“学科自觉”。基于经验证据，就各国政治现象给出一般化的“理论解释”，成为比较政治领域的明确研究目的。

特定时代引发的问题意识重设，以及知识论、方法论变革，为比较政治塑造了学术共同体的新共识与新标准。凭借自身研究对象范围宽广的优势，比较政治往往充当了

沟通“桥梁”，使得从其他学科借鉴的新理论以及在美国政治研究中率先使用的新方法（尤其是量化分析和博弈论之类的形式模型），借助跨国比较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范围”。通过以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据反复检验、修正、完善各种理论假说，比较政治开始引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创新，使政治学整体上成为更加标准化、更为内聚的学科。比较政治成为对所有国内层面政治现象的一般化理论研究，它与国际关系分别以国内政治现象和国际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构成当代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两大分支。在全球化时代，比较政治进一步与国际关系研究深度交叠，产生了对某些“跨国政治”现象议题的交叉研究。

因此，严格说来，今天政治学者熟悉的“比较政治”，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型的“社会科学”，只有70来年的历史。这期间，比较政治形成了什么样的独特“学问性质”与“问题意识”呢？

首先，比较政治聚焦于对政治发展或政治变革的“一般性解释”，从战前“比较政府”着重“描述差异”，变成战后“比较政治”探讨“一般理论”，核心问题意识的转换与学科知识目标的重塑相辅相成。将美国政治研究领域“行为主义革命”造就的科学抱负推广到比较政治研究领域，是推动这种知识论转化的学科内生动力；与彼时盛行世界的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解放学说竞争，则是推动这种知识论变革的现实外部条件。其次，比较政治奉行“拿来主义”。比较政治70来年，就是不断从其他知识领域“学习取经”的过程，哪怕纯粹演绎式的“形式建模”，也一样可以拿来分析比较政治议题。最后，比较政治刻意回避但又始终立足于特定“规范性立场”。从“现代化范式”到“民主化范式”，加上“依附论”和“发展型国家”这两个“挑战者”，我们不难发现各种研究范式各自背后都有清晰的价值预设。

归根结底，比较政治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革命性变化是研究对象拓宽、问题意识转换、知识观念重塑的结果，方法的不断精致固然加速了比较政治“学问性质”的转变，但从来就不是比较政治领域知识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 作为“科学”的比较政治：科学观促成共识，方法论扩大分歧

严格说来，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比较政治研究主要是因应时代变革的现实需求，回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美国政治研究示范下，转换“元理论”、重塑“科学观”，给出关于政治发展的新理论说明。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赖欣巴哈、卡尔纳普、亨普尔的“逻辑经验主义”及欧内斯特·内格尔的“自然主

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逐步影响了美国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像自然科学那样以“覆盖律”为中心建树的“一般性理论”成为政治学经验研究的主流知识论立场。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照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迅猛冲击的美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者对提出“理论”的兴趣，远大于对精致验证“方法”的追求。除了提出一般理论框架之外，国别研究及比较历史是最常见的研究类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之间、比较政治与政治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影响在此20年间也最为显著。

1968年4月和10月，两份重量级的比较政治专业刊物《比较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先后创刊。1970年普沃斯基和图恩的《比较社会调研的逻辑》、萨托利的名篇《比较政治中的概念误构》以及1971年李帕特的名篇《比较政治与比较方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比较政治研究迈入“方法自觉”阶段，经验研究的“行规”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确定下来。社会学及政治学科内美国政治研究的量化潮流，则为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自觉”作了外部示范。

我们不妨把1968年两份比较政治学刊的创立和1994年《设计社会调研》的出版看作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期间的20余年里，比较政治研究确立了自身的“科学标准”。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量化分析主导地位的巩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带来的冲击，比较政治研究有没有更加“科学化”见仁见智，倒是愈发变得“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大致表现如下：

其一，跨国比较成为量化技术的“演武场”，充斥着一大批罔顾数据自身局限和统计模型前提限定，只管拿嫁接的二手数据不断“拷问”的“奥数式”解题研究；其二，扎实的国别语言、历史文化训练被严重淡化，出现一大堆图表、符号、方程、矩阵、回归线支撑起来的“重造车轮”式常识发现；其三，以验证理论假说的必要为托词，反复“教鸟学飞”，却当成细化的理论创新；其四，严重低估跨文化研究语境引致的概念“误植”与测量工具不等效所造成的影响，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伪现象”硬凑成关键的研究变项；其五，只讲究“与文献对话”，不讲究去直面现实问题，把政治学研究改造成“阳春白雪”式的自娱自乐。结果是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显得脱离实际，外行瞧不懂，内行不屑谈，比较政治学者的工作与各国政治现实或政策运行基本无甚关联或“隔靴搔痒”。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学自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方法自觉”，再到20世纪90年代“量化霸权”的确立与21世纪逐渐起步的“方法论反思”，比较政治研究借助这一系列的批评与争论，一步步明晰了自身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品性。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并且，对研究方法过度的精致化要求，反而让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愈发脱离现实、不接地气，也未能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取

得类似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那样一批令人激赏的理论成果。其间的经验与教训或许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科学观”的重塑为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以“方法精致与否”来定义的“科学与否”，并非比较政治研究追逐的适宜目标。

### 镜鉴：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重述美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演生史”，我们不难发现：比较政治的知识进步，主要是冷战时代现实政治需求牵引的结果，是社会科学整体“知识观念”重塑的结果，也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研究“行为主义革命”和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推动的结果。70来年间，比较政治研究完成了从描述性“比较政府”向解释性“政治科学”的转变，完成了从结构功能主义“元理论”向检验一般性“中程理论”假说为研究目的的转变，完成了从初步接受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向精细的方法论探讨与反思的转变。通过不断“拿来”并吸收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成果，比较政治丰富了自身的知识体系，它在“科学自觉”基础上“学科化”的过程，反过来取消了“本国政治”与“外国政治”人为两分的合理性，进而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产生日益紧密的关联与交叠。与其强调“比较政治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不如说只存在作为政治学之中聚焦于各国国内政治现象的研究领域即“比较政治”。

反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重建过程中比较政治“学科自觉”的确立进程，我们不难察觉到一条不一样的知识形成路径：

首先，国内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引入，主要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兴趣，“学科自觉”的背后是满足“理论需求”。其次，比较政治研究迄今还没有对中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产生应有的促进作用。最后，中国政治学重建以来，从未经历过类似“行为主义革命”这样整体性的观念和方法冲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政治学界越来越重视研究方法训练，但我们直面的就是一个经过了量化分析与理性选择改造后的“政治学方法论”形态。

经过近40年引进消化吸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亟待从“而立”走向“不惑”，从“学科自觉”迈向“话语自觉”与“知识自觉”。

何谓“话语自觉”？美国政治学“建章立制”时期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从古典到近代欧洲文明的学理积淀，为现代政治学提供了成长壮大的知识土壤，但没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没有立足本国的学术抱负，就没有今天流行世界的美式“政治科学”，当然也不会出现“比较政

治”这个独特研究领域。欧美各国政治实践上的多样性，与西方文明历史传承上的共通性，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长于意象、短于逻辑，反衬了两大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作为“西洋舶来品”的政治学，如果我们只知其然而不论其所以然，难免只会在方法上邯郸学步、在理论上东施效颦，又如何可能摆脱所谓“经验研究”思维上一些潜在的话语陷阱，正视跨文化处境造成的认识误区呢？在平视西方政治学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我们要改变“仰视西学、求取真经”的心态，冷静地比较中西历史经验，系统地反思“经验研究”背后的认知差异，细致检视概念、理论与方法，切实改变“用中国字写西洋话”的尴尬局面。唯其如此，才谈得上建设中国自身的政治学。

何谓“知识自觉”？比较政治研究终究要“异中求同”，但政治学理论与各国实际之间，始终存在强烈反差。通过学术史的考察，我们还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乃至整个政治学，从来都是同现实的“时”与“势”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随着“科学”意识的强化，学者们对“一般性理论”孜孜以求，推动着比较政治研究在跨国量化手段上挖空心思，同时却越来越不习惯“走基层、接地气、挖细节”。精致方法一旦成为苍白材料的掩饰，比较政治也就难保不成为“花样文章”。

发现规律、揭示因果、解释现实，当然是包括比较政治在内的政治学经验研究致力于完成的任务，但不恰当地用自然科学对普适性的追求来规定约束政治学研究，反而会把社会科学理论异化为形形色色的教条与迷思。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精神、科学方法，究其根本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忽略特定处境、语境给政治学在问题设定、理论结论上造成的局限，把“基于特殊经验的普适表述”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加以接受，难免就会形成学术研究上“穿着（伪）科学新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风气。近些年来，许多英文比较政治研究作品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已经退化成空洞的“洋八股”，既谈不上什么新的理论创见，更与现实世界的急剧变化相脱节。如果把这样的研究奉为“前沿”乃至“圭臬”，那就完全无视了政治学基本的学理品性，对建设实事求是、中国气派的政治学也毫无益处。

政治学终究是“实践智慧”，“放眼拿来”不等于照搬移植，只有在知识论、方法论上保持充分开放的心态，直面世界各国政治的现实变局，去澄清范畴、提炼疑问、收集证据、作出回答、参与争论，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才能真正实现“自觉”。<sup>⑤</sup>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摘自《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5期；原题为《比较政治“学”？——学术史与学科性的反思》）